

# 语言转向视域下本雅明“纯语言”哲学思想之辨

吴长青

(湖北经济学院 外国语学院, 武汉 430205)

**摘要:** 尽管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发展议题常常处于被搁置和不被关注的状态,但这绝非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语言思想不够丰富。相反,构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体系不但十分必要,而且意义深远。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分析哲学或者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来讨论本雅明早期语言哲学思想,可以厘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雅明与同时期的分析哲学家们无意间推动的两条不同的语言转向脉络。换言之,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言,语言转向并非发端于分析哲学,而是肇始于本雅明的纯语言哲学思想。

**关键词:** 语言转向;本雅明;纯语言;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 B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2018)01-0104-06

19世纪以来,以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标志的语言转向的确给当代西方哲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似乎并未引起多少波澜,这并非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语言思想不够丰富,而也许是因为语言转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还在不断发酵”之中,或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研究者对语言转向“问题的意识还不充分”<sup>[1]</sup>。尽管马克思主义曾被批评为“对语言研究的贡献很少”,但随着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如对本雅明、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德里达、哈贝马斯、詹姆逊、阿甘本、勒赛克尔、柯亨等学者著述的挖掘,可以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未被充分挖掘,但实际上蕴藏着丰富的语言思想;同时,在语言维度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塑等思想,又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具有方法论和哲学思想新发展的双重深远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是通过“本雅明(1892—1940)、詹姆逊(1934—)、哈贝马斯(1924—)及柯亨(1941—2009)等人的思考和著述来完成的”<sup>[2]</sup>。

## 一、语言的溯源

按照语言的哲学三问:语言究竟为何物、语言来自何方、语言又将去向何处来思辨语言的本源问题,当首先追溯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位西方哲学的鼻祖。苏格拉底就语言中的名称是如何获得指称的问题,与克拉底鲁及赫谟根尼进行过对话,克拉底鲁是语言(名称)自然论的坚持者,主张“名称是自然的,而非约定俗成的”<sup>[3]57</sup>,赫谟根尼则是语言(名称)约束论的坚持者,他认为:“自然并没有把名字给予任何事物,所有名称都是一种习俗和使用者的习惯”<sup>[3]58</sup>。尽管苏格拉底对自然论和约定论都进行过批判,但他本人很可能更倾向于自然论,他说道:“克拉底鲁说得对,事物的名称是自然的,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提供,而只是那些能够看出事物天然名称的人才能这样做,才能用字母和音节表达事物的真正形式”<sup>[3]67</sup>。苏格拉底关于名称与指称的对话也正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留存下来。名称(无论是自然生成,还是约定俗成)通过字母和音节表达出来,意即“指称”,此可谓西方先哲对语言本体的最早形式的追问。在语言问题上,柏拉图相较于苏格拉底具有一套更加宏大的语言哲学论辩计划。就名称和指称问题,柏拉图试图调和自然论和约束论的争议,提出介于两者间的“第三种折衷的理论”<sup>[3]72</sup>。除《克拉底鲁

收稿日期:2017-11-01

作者简介:吴长青(1974—),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哲学博士,从事语言哲学、语言学研究。

篇》之外,柏拉图还在他的《智者篇》和《泰阿泰德篇》中通过给知识下定义进而探讨另一种语言形式,即陈述(或称之为“判断”或“命题”)是如何传递知识的。柏拉图认为,作为符号的语言是通过不同词性的词语(名词和动词)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搭配,即以陈述来传递知识,柏拉图以“陈述”的概念替代苏格拉底时期自然论和约束论所使用的“指称”(称呼),“(由动词和名词结合成的陈述)提供了关于事实,或关于现在、过去、将来的事件的信息;它不只是对某事物的称呼,而是靠着把动词与名词的结合,把你带往某处。因此我们说它‘陈述’某事物,而不是‘称呼’某事物,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用‘陈述’这个词表示的复合体”<sup>[4]</sup>。柏拉图进而认为,既然陈述是一种判断,那就存在“事实陈述”和“虚假陈述”,在其留存于世的13封书信中的第7封信中,柏拉图还就语言能否反映实在提出了一般看法。柏拉图的语言哲学思想最早触及人类对语言规则(语法)的思考,是西方哲学中最早的对语言的论述。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后世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哲学范畴,甚至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逻辑原子主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不同于柏拉图关于知识(语言)溯源问题的阐述,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批判了关于知识(语言)“天赋”的观念,提出著名的“心灵白纸说”。天赋论者认为,人的一切知识(包括语言)都是天赋的,知识(语言)的积累是“回忆”,而不是“记忆”。洛克则反驳了这一学说,他认为:人出生时心灵就像一张白纸,只有通过经验获取,心灵才逐渐产生了观念。洛克与贝克莱、休谟三人被并称为英国经验主义(British Empiricism)的杰出代表,洛克继承并发展了经验主义者培根、霍布斯的哲学思想,以他们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与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的持续论争,推动了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也即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尽管洛克的哲学成就更因其《政府论》的影响而在政治哲学领域地位显赫,但这丝毫不掩盖他在知识论和语言领域对语言哲学的巨大贡献。洛克认为,来自感官对外部世界感知的感觉(sensation)以及来自心灵观察的反思(reflection)是知识的唯一来源。那么,在洛克这里,就语言的本源问题,语言究竟属于感觉还是反思、是先天所有还是经验获取,就成为无法回避的

语言哲学命题。作为经验主义者的洛克,在语言本源问题上同柏拉图有相似之处,洛克仍然信奉上帝创造了语言,“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他不仅把人造得具有某种倾向,在必然条件之下来同他的同胞为伍,而且他还供给了人以语言,一位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sup>[5]</sup>。从洛克的论述中,我们似乎可以追溯到“语言工具论”的最原始的依据。此外,洛克语言的本源问题与源自《圣经》——语言巴别塔的寓言也有共通之处。《圣经》的《旧约·创世记》篇第11章记载,人类有共同的祖先亚当与夏娃,生活在古巴比伦城的早期人类希望联合起来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通天塔惊动了上帝,为了阻止人类想与上帝比肩的计划,上帝创造出彼此互不相通的人类语言,至此,人类无法相互沟通,建造通天塔的计划因此而失败,通天塔坍塌碎落而成为混乱之塔——巴别塔。巴别塔的寓意为人类语言和种族多样性提供了神学解释,为后世现代语言学者提供了思想源泉,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雅明纯的语言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索绪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的现代语言学、分析哲学的兴起。索绪尔被誉为“语言学之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即“语言的形式问题”被认为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论断也常常被认为是索绪尔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语言本体问题上,索绪尔打破了两千多年来既定的语言从属地位,“依附于人这个主体”的传统观念,赋予了语言的本体地位和语言具有生命的观念,“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一种已经构成的语言的正常的、有规律的生命”<sup>[6]</sup>。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对后世的结构语言学(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语言学派)、转换—生成语言学(乔姆斯基)、系统—功能语言学(韩礼德)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支撑。罗素是现代分析哲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除逻辑分析的工具及其运用研究之外,罗素还在逻辑原子论、逻辑构造论、摹状词理论和类型理论等方面造诣颇深。罗素主张建立一种“理想的”或“哲学的”语言以消除日常语言词汇和句法对哲学的消极影响。罗素虽然没有就语言的本体问题直接展开论述,但其试图解决“语言意义不清”的本源问题,“心、物质、意识、知识、经验、因果观、意志和时间。我认为所有这些概念都

是不精确的和大致相似的,它们的主要毛病是含混不清,不能够成为精密科学的一部分”<sup>[7]341</sup>。罗素所创立的逻辑分析哲学试图调和与消除两大哲学流派对立的局面,“(哲学流派)一派人的思想主要是在数学的启发下产生的,如柏拉图、斯宾诺莎和康德等人;另一派受经验科学的影响比较深,如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以及洛克以后的经验主义者”<sup>[7]65</sup>。罗素的思想对分析哲学的另外两位创始人——摩尔和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卡尔纳普,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奎因以及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柯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维特根斯坦称得上是罗素的学生,其与罗素属于同一时期伟大的语言哲学大师。其语言思想同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一样,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20世纪的前20年的早期阶段,《逻辑哲学论》是其早期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缔造了旨在追求理想语言状态的“语言图像说”——前期维特根斯坦将世界定义为图像,“将语言和世界的逻辑同构关系作为意义生成机制。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图像’来显现,图像就是对思想的摹画,思想能动地反映世界和语言,它以形成图像的方式沟通命题与实在”<sup>[8]</sup>。究其本质,图像论可归属于以“语言工具论”为基础的意指称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哲学研究》则集中反映他后期的哲学思想。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他曾坦言是对前期哲学思想的纠正,是因为“第一本书里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后期他试图“通过回归日常语言的方式”,通过缔造“语言游戏”的新概念对前期“批判日常语言,追求理想语言”进行反批判。维特根斯坦前期所认可的“单一对象的名称是语言的终极成分”“语言描绘现实,命题或语句是现实的图像”“每个基本命题都是事态的图像”“日常语言缺乏精确性”等观点,在其后期的著述中都被予以了否定与批判。

求知乃人类之天性,对语言“本源”问题的探讨历来有之,由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笛卡尔、洛克,再到现代语言(哲)学时期的索绪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对语言“本源”问题都有探讨;1990年,美国现代语言哲学家杰罗德·卡茨撰写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就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意义理论(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及奎因意义理论)发起攻击,意在建立以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意义形而上学;20世纪末,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对 Foxp2 基因(Forkhead

box p2)即“叉头框 P2 基因是控制语言能力发展的基因,位于第7对染色体”的这一发现,开启了神经语言学及生物语言学的历史先河。由此可见,人类探究语言本源问题的步伐从未停止。

## 二、语言转向视域下的本雅明

西方哲学的第一第二次转向虽然存在诸如表述上的差异,如将第一次转向称为实践哲学的兴起<sup>[9]19</sup>,或伦理学转向<sup>[9]20</sup>;将第二次转向称为知识学的繁盛<sup>[10]33</sup>,或认识论转向<sup>[10]34</sup>,但是,在本源上由自然哲学向心灵哲学的转向、由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向的前两次转向实际上是为世人所熟知亦被广泛认可的。苏格拉底在哲学上主张从心灵中寻找外部原则,然后再依照这些原则来规定外部世界,从而实现西方哲学由自然哲学转向心灵哲学;培根率先提出以实验归纳作为认识的工具,之后的笛卡尔开辟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尔与培根被认为共同开启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洛克进一步发展了认识论转向,康德则通过其提出的三大批判基本回答了“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和“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三大哲学命题,三大批判实际将本体论哲学推向了认识论哲学的顶峰。可见,哲学的前两次转向的脉络是清晰的。对于是否存在西方哲学的第三次转向,即是否存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问题,历来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即便在承认以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为界,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或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哲学的语言转向,但就转向的原因、过程、逻辑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将本雅明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转向的开创性人物,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基于本雅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身份的认定。青年时期的本雅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可以追溯到1915年7月第一次参加社会主义者库尔特·希勒的演讲,好友肖姆·肖勒姆送给他一期也是唯一发行的一期《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精神》,本雅明曾评价这本杂志“极好”。1919年底,本雅明在奥地利居住期间,撰写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情者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的评论,开始真正接触并思考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初,本雅明读到了“那代人中最具叛逆精神、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最重要著作,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

与阶级意识》”<sup>[11]71</sup>。1925年5月底,受经济所迫的本雅明在给朋友的信中甚至表达了“令人深切悲叹的文学与经济计划的冲突”,考虑了“也许会加速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至少可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临时去一趟莫斯科——并加入共产党”<sup>[11]70</sup>的想法。本雅明在申请法兰克福大学教职期间,结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尽管本雅明当时申请讲师资格的论文《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因各种原因遭到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拒绝,但后来,阿多诺仍组织了一批优秀学生参加了针对这部作品的学术研讨会,表达了他对青年本雅明的赏识。1928年,本雅明与被苏维埃商会派到德国工作的电影顾问阿西亚·拉希斯接触,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sup>[12]224</sup>的活动。到1930年前后,本雅明开始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院频繁接触,成了阿多诺坚定的拥护者,并开始为法兰克福学派1932年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撰稿,其间,在该杂志发表《关于法国作家的社会现状》(1934)、《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等作品。由于本雅明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隐藏与晦涩”,观点似乎很“摇摆”,他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文章几乎全部受到左派作家各种批评,并一再被要求修改。尽管如此,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巴黎,19世纪的世界之都》等作品受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的赏识和赞扬,阿多诺专门写信给时任社会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极力推荐资助出版。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侧重于哲学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其经历了自20世纪20—30年代的创立、30—50年代的流亡、50—70年代的繁盛,到70年代后期的转折近百年的发展,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编外撰稿人的本雅明,虽然自始至终未能真正加入法兰克福学派成为其正式成员,但由于他本人与这一学派客观存在的联系,以及他本人受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影响,思想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总体上已经保持了一致,这些因素成了本雅明可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或称之为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本雅明这一时期的思想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救赎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救赎理论<sup>[13]</sup>。但又由于本雅明思想的复

杂性,导致研究者对其思想产生多种不同的解读,正如哈贝马斯所评述的,研究者往往按照各自的意愿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卡巴拉式”“新保守主义”的本雅明。

第二,基于本雅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本体问题始源性的哲学思考。大卫·菲瑞斯曾将本雅明的语言哲学思想分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al)、神秘主义(mystical)、认识论(epistemological)和唯物主义(materialist)等四个部分<sup>[14]</sup>。实际上,本雅明一生都未能赢得一所大学或研究所正式研究员(教员)的身份,因缺乏持久的经济来源,他的学术研究也非常的不稳定,本雅明的学术巅峰正处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期(1922—1932)及二战流亡期的前半个阶段(1933—1940)。在本雅明之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期绝少有学者关注语言问题,但本雅明的学术生涯恰恰发轫于对语言的关注。如果按照时间维度,本雅明的学术研究可能只需要分成两个阶段:1933年之前的早期阶段和1933年之后的流亡阶段。本雅明1933年之前的作品对语言本体问题的哲学思考正是集中在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上;1933年之后的流亡阶段则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语言社会学问题”的“言语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1916年,尚在慕尼黑学习的本雅明发表了三篇“广义上是论经验、翻译和语言”的专题论文:《“悲苦剧”和悲剧》《悲苦剧和悲剧中语言的作用》和《论本质语言与人的语言》,三篇文章均试图澄清“语言的本质”问题。本雅明相信,“知识、司法和艺术的本质问题关系到人类依靠语言表达思想的起源问题”,认为语言是思想“交流”的“中介”,但语言的本质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还是“思想要义的交流”,语言在“语言学意义上的本质”同语言作为“思想的本质”不可等同;此外,这一时期,本雅明还对诸如“语言中有原罪吗?世界上的精神存在能用语言表达吗?”<sup>[11]33</sup>等事关语言本源的问题进行了追问,对语言的工具性滥用进行了批判。本雅明试图赋予语言新的概念,“用词语战胜黑夜”“从而为其批判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撒播下寓言性的种子”<sup>[12]109</sup>。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时期写的《相似的教义》,以及《社会科学杂志》刊发的《语言社会学问题》等文章,虽在脉络上与前期的作品“隐隐约约有一根连续的思想脉络主线”,但在语言问题上,本雅明后期研究的重心的确已经发生了转移,并

且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大体已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了。

### 三、本雅明纯语言哲学思想之辨

本雅明早年于1916年发表的《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被认为标志了其语言哲学思想的开端。本雅明在该文中对语言给出的界定是“所有精神内容的交流构成语言”(all communication of spiritual contents is language)。本雅明认为,“精神实质的交流是语言本身的交流而不是借助语言工具交流”(in language but not through language),这一论述在实质上对语言工具理性提出了批判,而“所有的语言以其自身实现交流”(all language communicate itself in itself)则赋予了语言的主体地位。本雅明就“物的语言”——所有物的语言学的存在就是他们的语言(The linguistic being of things is their language.)类推“人的语言”——人的语言学的存在就是人类的语言(The linguistic being of man is his language),人通过给物命名(naming)来实现精神上的交流。本雅明由此将语言分成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分别是最低级的物的语言、第二层次的人的语言以及最高层次的上帝的语言(即纯语言)。本雅明认为,物的语言是上帝造物时残留在物本身的精神存在,是“不完善的”“沉默的”的语言,亚当夏娃未偷尝禁果之前,人的语言是通过对物的“命名”来认知世界,“人在天堂的语言应该是拥有完善知识的语言”,但自人类堕落以后,语言也堕落为“言说这个世界的工具”,上帝的语言是最高层次的语言,是“具有创造和命名双重能力”、最完美“纯”的语言,“(上帝的)语言既是创造性的也是完成了的创造”。1923年,本雅明在翻译法国现代派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的作品时,撰写了序言《译者的任务》,在这篇序言中,本雅明首次对“纯语言”下了晦涩的定义,“所有史前(suprahistorical)语言间的裙带(kinship)关系都存在于作为整体的(as a whole)每一种语言可辨识的意指(intention)之中——但是,没有一种简单的语言能通过自身达到这种意指,而只能通过语言间互补的各种意指的集合(by the totality)才能达到,这一意指的集合即纯语言(Pure Language)”<sup>[15]</sup>;本雅明将纯语言比喻为“尚未破碎的瓷盘”,而各种语言则是散落“瓷盘的碎片”。本雅明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未来哲学纲要》(1918)、《语言与逻辑》(1921)、《反

思洪堡》(1925)以及《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1928)等,基本都沿袭了他的纯语言的哲学思想。

本雅明性格独特怪异,思想独立,即便他的博士生导师理查德·赫伯兹也被他描述为“毫无色彩”,对他的思想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本雅明短暂一生中,对其思想影响较大的人并不多,但被他称为第一导师的魏因肯及他的好友肖勒姆却对他的思想有所触动。“他的哲学源自他的第一个导师魏因肯,也常常回归这条根”<sup>[11]26</sup>,而魏因肯的教育理念则源自康德、黑格尔、歌德和尼采。本雅明于1915年7月在柏林求学期间与肖勒姆邂逅,从此成为一生的好友,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肖勒姆信奉犹太教神学思想至深,他曾帮助本雅明逃避服兵役,两人曾彻夜长谈哲学、犹太教、卡巴拉、政治,“(本雅明)与肖勒姆的友谊和他思想中的神学维度紧密相关”<sup>[16]</sup>。此外,本雅明犹太德国人的血统及身份注定他早期神学的语言哲学思想受犹太教及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至深。本雅明大量的关于语言本源问题甚至直接来自犹太教的《摩西五经》即《创世记》;而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正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本雅明青年时期所经历的一战的德国恰恰为德国浪漫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沃土。从严格意义上讲,无论从时间,还是从思想转变而言,本雅明这一时期的语言哲学观都不能因为其后期法兰克福学派身份的认定牵强地被归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语言哲学观(或萌芽);相反,在这一时期,本雅明的神学思想深深地融入了他的语言观,正如他自己的描述:“我的思想和神学的关系,就如同吸墨纸和墨水的关系,我的思想饱蘸神学,倘若抽掉墨水,吸墨纸上将坦然无存。”<sup>[17]</sup>

本雅明认为,只有上帝的语言即“纯语言”才是真正的语言,虽然因为人类试图建造的通天塔坍塌仅留下巴别塔(混乱之塔)的遗迹,人类原生活的“纯语言”零星散落了,但人类凭借记忆,“纯语言”模拟上帝的语言给物命名。本雅明早期语言哲学思想产生的时期,正处于欧美分析哲学大行其道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以“分析”为特征的语言哲学成了学界的热词,由此开启语言学新学科的发展以及哲学研究对语言的关注。1916年,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1917—1919年,罗素的《哲学问题》《逻辑原子主义哲学》《数理哲学导论》相继问世,1913年,维特根斯坦发表《逻辑笔录》,1922年又发表了《逻辑哲学导论》。本雅明的语言哲学同西方分析哲学处在同一时期,也正是西方哲学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的时期,因此,本雅明完全可以被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转向的肇始,但本雅明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却有着“完全不同于分析哲学”的思考,属于“当代语言哲学研究的第二条道路”<sup>[18]</sup>。

### 结束语

哲学的语言转向研究,历来多聚焦于传统的意识哲学向以语言和逻辑为基础的分析哲学的转向研究。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问题常常处于被搁置和不被关注的状态,正如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让·雅克·勒塞克勒所说:“很显然,诸多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像其他的学科——如政治经济学或者美学——一样提出一个关于语言问题的学说。”但是,建立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意义深远的,而且,简单地套用现有的分析哲学或者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问题是不充分的。通过对本雅明语言哲学问题的解读,可以得出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雅明与其同时期的分析哲学家们无意间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转向。换言之,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语言转向并非发端于分析哲学,而是肇始于本雅明的纯语言哲学(语言神学)思想。

### 参考文献:

- [1] 尹树广.语言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
- [2] 俞吾金.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语言学转向[J].河北学刊,2005,(6):41.
- [3]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M].王晓朝,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 [4] 李国山.柏拉图语言哲学探析[J].南开学报,2005,(3):109.
- [5] 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83.
- [6] 李文新.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刍议[J].外语学刊,2012,(2):7.
- [7] 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8] 谢萌.“图像论”意义观的本体论解读——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拓展性研究之一[J].外语学刊,2012,(6).
- [9] 杨方.从西方哲学的三次转向看哲学对象的演变[J].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 [10] 向华.论西方哲学的三次转向[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 [11] 伊斯特·莱斯利.本雅明[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12] 毛姆·布罗德森.本雅明传[M].国荣,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 [13] 王雨辰,杨礼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09.
- [14] Ferris S. Davi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alter Benjamin[M].Cambridge: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55.
- [15] 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C]//SchulteRainer, BiguenetJohn.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en to Derrida.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3:71-83.
- [16] 刘琳.废墟上的英雄主义:论本雅明思想中的现代立场[J].哲学研究,2014,(5):67.
- [17] Benjamin Walter.The Arcades Project[M].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471.
- [18] 蓝江.语言哲学下的生命政治——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语言转向[J].哲学动态,2013,(12):41.

[责任编辑:张圆圆]